

全五卷精裝本

國共兩黨關係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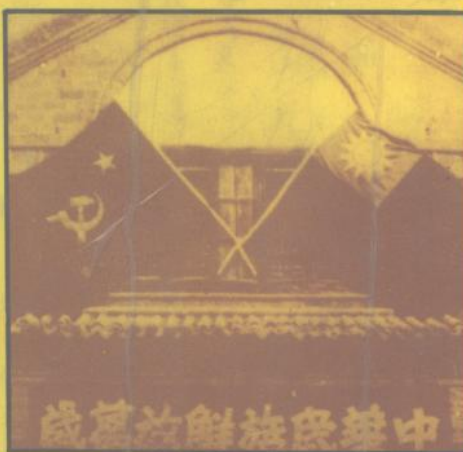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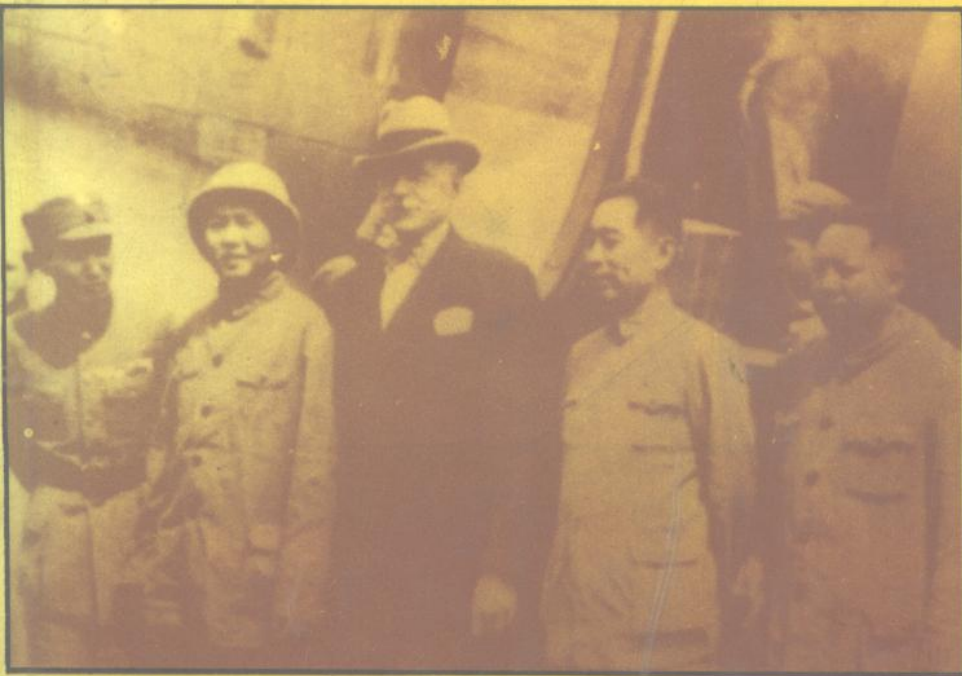
屈武



王功安
毛磊

主編

武漢大學出版社



K266.19
2

81716

国 共 两 党 关 系 通 史

(五卷合订本)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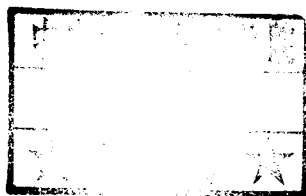
王功安 毛 磊

副主编

杨光彦 任希健 萧志华 杨存厚 郭文清



200209648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1991 • 武昌

国共两党关系通史

(五卷合订本)

主编 王功安 毛 磊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84.625 印张 1486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201—5300

ISBN 7-307-00982-x/K·75

定价:45.00 元

本书顾问、各卷主编及作者名单

顾问名单

程思远 全国政协副主席
平杰三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王千弓 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各卷主编及作者名单(按分工章节为序)

第一卷

主编 郭文清 王海琳
作者 王海琳 毛传清 陈仲安 白素玉 郭文清

第二卷

主编 任希健 范小方
作者 任希健 范小方 毛磊 李明

第三卷

主编 杨光彦 陈明钦 马德茂
作者 毛磊 陈明钦 唐守荣 杨光彦 杨淑珍 马德茂
周秀芳 宋洲

第四卷

主编 杨存厚 张春英
作者 张春英 杨存厚 汤一如

第五卷

主编 萧志华 何又明
作者 王海琳 朱务本 萧志华 何又明

绪 论

一、国共两党关系史的产生

国共两党关系史作为一门科学,已被史学界的多数学者所承认,但这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前及十年浩劫中,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研究工作中的禁区。即使有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讨,也是零碎的、孤立的,谈不上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直到 80 年代后期,才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深刻说明国共两党关系史的产生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回顾这个过程,对于认识这门新学科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产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科学的春天终于降临到人间。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感只研究这两门学科本身的内容,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国共关系有了新发展的形势下,更需要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国共关系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便应运而生。

先是在武汉地区的一些大学文科中开设了国共两党关系史的课程,受到了大学生的欢迎。他们认为开设此课程是很及时的。接着,北京、西安、南京等地的大专院校也相继开设了这门课程。这就为全面系统研究国共关系史作了有益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由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武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会长王功安与中南财经大学毛磊教授担任主编、有近 10 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写作班子于 1986 年成立,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奋斗,1988 年 5 月,我国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专著《国共两党关系史》,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为了推进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由武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武汉

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团结报》社、武汉出版社共同发起召开的“全国首届国共两党关系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1月在武汉举行。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进入到新阶段。从此，由过去只研究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发展到研究两党的整体关系；由少数地区研究国共关系而扩大到全国的范围。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来了。诸如：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两党之间关系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的话，这些规律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建立这门新学科的体系？等等。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门新学科的发展。我们在原来单行本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五卷本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与此同时，陕西师范大学张广信同志主编的《国共关系史略》于1989年正式出版，并由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发起，于1990年4月在西安举行了“全国第二届国共关系学术讨论会”。接着，由南京师范大学苏仲波同志和南京大学杨振亚同志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也于1990年7月正式出版。另外，《国共关系问题》、《国共关系研究》等论著也纷纷出版发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在大量论著发表的基础上，有关国共关系理论问题的争论也迅速展开。近两年来的争论集中在四个问题上：（1）关于中共“二大”前国共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此时两党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虽然也有某些配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两党此时处于相互配合的状态，虽然也有相互排斥的某些表现。（2）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战线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已构成了第三条战线，主要是根据朱德同志的论述与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个结论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未提第三条战线，不应过高估计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作用。这个问题争论甚为热烈，成为全国党史学会1990年的年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3）关于国共关系史的分期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两党开始合作与彻底分裂的标志应以两党中央的态度为标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对方公开宣布另一方为敌人时才算彻底分裂。（4）关于国共关系有无规律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只有70年，时间较短，谈不上有什么规律；另一种意见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国共关系是个重大问题，更有规律可循。总之，争论的问题既多又热烈，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说明这门学科的确是应运而生了。

（二）产生的基础

在短短的几年中，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学界研究工作的热点之一，决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多方

面的原因。

首先,国共两党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两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民主革命时期,决定着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在社会主义时期,关系着祖国的统一与振兴。因而可以说:两党关系是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早就应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却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大好形势下,学术界开始对这个课题作深入的研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的问题后,国共两党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而深入研究国共关系,科学地论证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际可能性,使海峡两岸人民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共同努力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也就是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历史的、理论的根据,就成为学术界一项光荣的任务。所以说,《国共两党关系史》的产生,是实施“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客观要求。

第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不仅直接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影响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

二、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规律问题

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已经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70年中,两党有过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再度酝酿合作的曲折。要回答为什么会有这些曲折,要弄清两党关系发展的过程,要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毛泽东说:“不论做任何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 要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弄清其规律,这是国共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规律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下同),第171页。

发展的规律,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来看,错综复杂,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但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却又是线条清晰、因果分明,其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决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也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以两党主要领袖人物的意志而随意变化的。有人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两党领袖人物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就决定了国共关系的状态。按照这个说法,国共两党关系如何,两党领袖人物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领袖人物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这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存在于两党关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①这就明确地回答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是孙中山这个领袖人物头脑发热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孙中山只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当“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反共,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形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②这个论断也是很明确的,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也不是以中共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国内外多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领袖人物如能把握客观规律,适应客观规律,就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如违反客观规律,则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总之,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既不是什么要台湾当局“投降”,也不是共产党领导人心血来潮,而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是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那么,国共两党关系有哪些规律呢?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515、172页。

(一)国共关系在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及再一次酝酿合作中曲折发展。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对于这一规律,有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历史循环论。还认为,如果这个规律能成立,在第三次国共合作后是否将来又要再来第三次分裂呢?总而言之,他们否认这是国共关系的一条规律。我们认为这条规律能够成立的主要根据是:这是70年走过的道路,两党关系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走过了70年的历程。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客观事实,我们没有附加任何东西。只是把两党七十年关系的发展轨迹如实地描绘出来罢了!

国共两党关系是以合作为开端的。当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对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是采取独立立场的,主张“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①而国民党呢?从兴中会算起,建党已经20多年,又领导过象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斗争,在中国人民中有相当的影响。从这种情况看来,一个不愿与其他任何党派建立关系的刚成立的小党,是不可能与一个有影响的大党携手合作的,但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奇迹出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但也在斗争的实践中,特别是从“二七”惨案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的中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仅仅只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难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因此,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经过了多次革命的洗礼,但却面临着很多问题,主要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虽然经过多次改组,还是“洗不清民国元、二年国民党的余染”。^②纪律松懈,日渐退步的状况仍无多大改观,“一人一见,一地一习,标语既殊,精神自异,号称为党,仅属空名。”^③这样的党是不能担任打倒军阀,建设国家的重任的。要改造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增加新生力量。因此,孙中山力主与共产党合作,利用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④,来拯救国民党,推进中国革命。

这样,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为求两党的发展,为求革命的胜利,国共两党的合作建成了。国共合作后,两党党员战斗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9页。

②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参见《革命文献》第9辑,第54页。

③ 戴季陶:《国民党的继往开来》,参见《革命文献》第8辑,第167页。

④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宋庆龄选集》第465页。

但这种合作没有实行多久,仅仅三年后,就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破裂了。两党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于国民党,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① 国共分裂后,十年内战,血海深仇,冰炭不可同器,水火不能相容,两党合作似乎已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这种分裂终于没有长期持续下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经过长时间酝酿,两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姿态,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抗击外敌入侵,真可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再次分裂,又是兵戎相见。到 8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第三次国共合作又在酝酿之中。

根据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再次酝酿合作”,是国共两党关系史的主要规律。当然,每一次合作与每一次分裂,又不是前次的简单重复,而是曲折中发展,螺旋式上升。从两次合作来看,第一次合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第二次合作则是两党保持各自独立的党外合作;第一次合作,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权,第二次则是两党有军队、有政权的合作;第一次合作,没有达到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夺取北伐战争最后胜利的直接目标,第二次合作,则达到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等。显然,第二次合作是在第一次合作基础上的发展。

从两次分裂来看,第一次分裂后,国民党利用其夺得的权力,大肆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杀害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十年分裂成为十年内战,双方进行着“围剿”和反“围剿”的生死搏斗;而第二次分裂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结果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到台湾岛上。此后,两党处于冷战状态,共产党并没有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权和军队去攻打国民党,而是积极在大陆进行经济建设,并适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这说明,第二次分裂也不是第一次分裂的重复再现。

在合作与分裂交相替代的过程中,合作又是主要的方面,合作代表着整个两党关系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首先,国共两党关系是以合作为开端的,这就奠定了两党合作的基础。所以,尽管在两党实力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尽管在两党已相互对立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在民族危急的严峻形势下携手称兄弟、一笑泯恩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85 页。

其次,即使在两党分裂时期,也有局部的、短期的、不同层次的合作,构成国共两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关系。再次,分裂时期总的趋势是由分裂向合作的方向发展,国共两次分裂都是如此,裂口不是越来越大,而是呈合拢的态势,最后形成新的合作。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尽管纷纭复杂,我们只要掌握合作这个主要方面,就可以预见到第三次国共合作必然会形成,以坚定我们统一祖国的信心。这种多次反复决不是“历史循环论”,而是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二)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毛泽东 1938 年 5 月 4 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演时提出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于 1990 年 6 月 12 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继承第一代领导人的优良传统,明确指出:海峡两岸,“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这里虽然讲的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统一问题,但主要内容还是指的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因而我们把这个科学论断作为国共关系的一条规律就有理论依据。以下着重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证这个问题。

1. 两次合作,国共两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新纲领,才“复活和发展了他的三民主义”。^① 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很快成为充满朝气与革命精神的党,组织发展迅速,在全国各省大都建立了党部,党员达到数十万人。而且,由于两党的共同努力,一个正规的以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为特征的新型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支由自己严密控制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革命军上下均须有为党、为主义、为国家、为民众而牺牲的决心”。^② 从此,国民党有了一支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服务的武装力量,并在全国建立了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由于国民党放弃了“围剿”红军、“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此,受到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的欢迎。有些中间党派甚至提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③ 表示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一方面表现中间党派天真的幻想,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的威信比以前大为提高。而且,国民党内也比以前团结了,国民党各派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以新的姿态

① 《周恩来选集》上册,第 112 页。

② 《军事政治月刊》第 1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

③ 《文汇报年刊》,1939 年 5 月出版。

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从共产党方面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全国仅 400 多名党员,到合作后的 1927 年 5 月,全国党员发展到 5 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并掌握了一部分军队。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发展更快,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 120 万党员的大党,领导着 1 亿多人口的广大解放区,掌握了 120 万军队和 220 万民兵的人民武装,同时,共产党的影响深入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2. 两次分裂,国共两党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从共产党来说。所受最大损失就是牺牲了大批优秀党员。国共第一次分裂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 国民党凭借庞大的军队、特务、警察、宪兵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在上海,1927 年 4 月 12 日至 15 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了 300 多人。在广东,经过 1927 年 4 月、6 月两次“清党”,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达 2 100 多人。其他地方,如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也相继展开了“清党”。在汪精卫于 1927 年 7 月 15 日分共后,这种屠杀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仅 1927 年 4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总数达 33.7 万人,到 1932 年以前被杀害的达 100 万人以上,其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据初步统计,从 1927 年至 1936 年的 10 年中,被国民党所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几十万。毛泽东在 1936 年 12 月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这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第一次分裂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特别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肖楚女、向警予、彭湃、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先后牺牲。这些优秀干部的被害,确实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使共产党感到群龙无首,处境十分艰难。正如周恩来所说:“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②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即使国民党内一些具有正义感的人士也是十分惋惜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就曾愤慨地指出:“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93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7—28 页。

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绝后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①

第二次分裂后，两党进行了三年多的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必须明确，这次分裂是国民党主动挑起的。共产党是不愿意分裂的。两党不分裂，中共凭着自己的正确路线和模范行动，也必然会取得全国人民的信赖。也就是说，不论国共两党是否分裂，中共因为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为民族谋利益的，都会取得胜利的。而分裂后，中共要取得胜利则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就是说，要通过人民战争而取得胜利。这种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刑场上坚持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上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朱瑞、李兆麟、罗世文、车耀先等，下至普通党员、一般战士如刘胡兰、孙继先、董存瑞、郭继盛、王克勤等，都是在两党分裂时期英勇牺牲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是重大的损失。

从国民党来看。他们造成了两次分裂，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是自食恶果。损伤了自己。一方面，国民党在分裂后，篡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丢掉了这面革命旗帜，也丢掉了整个革命精神。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主张“组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②。而国民党在两次分裂时期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压迫；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而国民党在两次分裂时期，实行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独夫有权，人民无权；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主张耕者有其田，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而国民党在两次分裂时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操纵了全国经济，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到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崩溃，人民已经走到饥饿和死亡的边缘。由于国民党丢掉了革命旗帜和革命精神，也就失掉了人民的拥护，在两次分裂时期，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最后，国民党成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的党，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对于国民党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后，也造成了自身的分裂。国共两党分裂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宋庆龄、邓演达等都相继离开国民党。另外，由于蒋介石把国民党变成独裁统治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愿望，也引起了一些国民

^① 陈铭枢：《‘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救国文选》，救国出版社。

^② 《孙中山选集》，第592页。

党人士的不满,这就势必导致国民党内的分裂。国共第一次分裂后,国民党内出现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再造派,还有丁惟汾派,孙科派,冯玉祥派,阎锡山派,加上原来的西山会议派等,煞是热闹。国共第二次分裂后,国民党内分裂更为严重。派系重重,四分五裂,这是国民党始终不能医治的一大顽症。

特别严重的是,国共两次分裂,对中华民族、对整个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使中国殖民地化程度更加加深;由于国民党不断进行派系混战,不断“围剿”共产党,战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国共分裂最大的损失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共两党严重对立,国民党反动派忙于内战,无暇北顾,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残酷的迫害和屠杀所造成的内政纷乱、国力贫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严肃指出:“‘剿共’四年(1927年至1931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1937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①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总之,翻看国共两党关系70年的历史,合作则两党获得发展,国家繁荣、民族兴旺;分裂则两党都遭受损失,对国家和民族也是不利的。毛泽东曾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第一次分裂进行总结时作了说明:“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②这个总结是十分精当的。是两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是,关于这条规律,学术界争论较大。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宣传口号而不是科学论断。台湾学者更是彻底否定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因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规律。

(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便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③这种矛盾一直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这就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每一个具体阶段,每一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82、364、631页。

个特定历史时期,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决定着中国社会中各阶级及其政党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中对待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这就决定着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

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这样,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了,这种合作,适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因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于是,旧式的北洋军阀统治改变为国民党新军阀式的统治,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国民党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从质的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依然是反帝反封建。但从形式上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没有变,人民大众与原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人民大众与国民党新军阀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便由原来的朋友变成了敌人。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反革命专政;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提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口号,“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①这就开始了国共两党十年分裂内战的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②

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直接危害到中国人民的生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损害了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上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都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③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4、254、149页。

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①提出“一致抗日”,“联蒋抗日”的口号,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派出代表,多次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动作出很多让步,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在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正视现实,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接受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这样,国共两党终于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中日间的民族矛盾解决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卖国,坚持“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③而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样,国民党又一次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终因国民党的破坏而再度分裂,开始了第二次分裂时期。

我国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就规定了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个主要矛盾就规定了必须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这个基本矛盾出发,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

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国共关系的状况。我们只有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这条线索,就能很好地把握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而努力。对于这一条规律,学术界争论很少,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共识,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四)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两党关系如何,对中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4、255、1103页。

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又是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因此,两党关系如何,对世界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的重视。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中国的政治战略也不同,进而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不同,对两党关系的态度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对国共关系所施加的影响的不同。国共关系处于这种大的国际环境下,其发展变化必然受到这种环境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受其所制约。

本世纪的 20 年代前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就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和物质上的巨大帮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从支持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战略出发,积极支持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1922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 日,由共产国际主持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指示,大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认为“工人阶级为了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取得喘息的机会,承认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是不可避免和可以接受的。”^①会后,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中国代表张国焘、瞿秋白、邓培,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能采取合作的方针。并且,共产国际和苏联先后派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庭等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正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才得以迅速建立起来。

到了 30 年代中期,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战争攻势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展开,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快建立广泛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一举动,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赞同,季米特洛夫曾明确表示:“我们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内的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这种提议。”第二次国共合作正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逐步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可以说,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有利于人民和革命的国际形势下形成的。

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完全相反,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

①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第 448 页。